

勉强答应和坦诚拒绝

世象管见

吴启钱

前不久，一位仅有一两次工作接触的老总给我打电话，问是不是熟悉某法院某执行法官，或者能不能通过其他人找到这位法官。

要在以往，我对这样的求助，会勉强答应：某法官我不认识，但我可以试试通过其他人找到他。我给自己的理由是，人家真的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向我求助既表明他确实需要帮助，也表明了对我的信任，让我觉得有面子。而且，尽管是勉强答应，但是通过其他人找到这位法官也不难。

但是，这次我没有勉强答应。我说，对不起，我不认识这位法官。我建议你再找找其他人，或者通过执行文书上留的联系方式，直接给这位法官打电话，不要耽误事情。除了说“谢谢你的坦诚”，这

位老总没有再说什么，我也感到一阵轻松。

都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人生在世，谁都不可能拥有通天本能的超人，谁都可能向别人求助，也完全可能被别人求助。无论是人情社会还是契约社会，概莫能外。再说，助人为乐是一种传统美德，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即便如此，多数情况下能不开口就不开口求人。一旦求人，什么面子自尊，可能都顾不上了。比起求人难，拒绝别人的求助更难。拒绝时，不得不顾及当下：自己的面子，朋友的交情，其他社会关系；也不得不“放眼”未来：自己是否哪天也可能向他求助。

顾虑一多，一张不忍拒绝、不敢拒绝、不能拒绝的情绪之网，就把自己给罩住了。于是，勉强答应便成了自以为的最优选项——这其实也是最蠢的选择，因为勉强答应

的结果，往往是害己误人。勉强答应之事，要助肯定是有难度的。或者是政策法律不允许，或者是客观情势有障碍，或者是自己本事不够，力有不逮，甚至就是自己内心所不情愿的。这些情形下，要不负于求助之人，则只有委屈自己，消耗掉大量时间和精力。网上就有网友对此写道：我的不幸，恰恰在于我缺乏拒绝的能力。

如果能够帮助到求助者，自己委屈一点，真的没有关系。可问题在于，勉强答应，到头来可能误了别人的事。

有一个外地来宁波工作的专家，因某种原因不符合人才引进政策，正规渠道解决不了孩子的转学问题。专家通过朋友找我帮忙，我在教育系统没什么人脉关系，不过碍于面子，勉强答应。

既出于勉强，办事必不积极。过了半个月，朋友打来电话，先是很客气地问所托之事。得知办得并不顺利，朋友说，不用为难了，专

家已经找到其他的路子。朋友又补充了一句，这个星期办不好手续，孩子就转不进来了。

正是这补充的一句，吓了我一跳：差点误了人家的大事！此后，我在面对别人的求助时，基本上做到了要么爽快答应，要么坦诚拒绝，决不走勉强答应这个“中间道路”。

坦诚拒绝之后，后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不仅没有失去面子，没有失去朋友，很多时候反而赢得了尊重，增进了信任。帮是情分，不帮是本分，人家也理解。

作家毕淑敏说过，拒绝是一种权利。但是，权利的行使，并不需要表现得理直气壮，坦诚拒绝也不意味着粗暴直接。最好的方式是态度果断而语气诚恳，让对方了解你的难处、你的真诚和你的善意。如果能将心比心，帮对方找到替代方案或者其他出路，于他有益，于己心安，则为上策。

从“沆瀣一气”说起

随思录

陈鲁民

近日，上海某高校自动化系在网络上发布了一篇《我们的抗疫手记》，本是好意表扬和激发学生们的意志力，没想到开头导语就把网友们逗笑了。文中写到“在抗疫工作中，全体师生沆瀣一气，团结向前……”

“沆瀣一气”，指臭味相投的人结合在一起。与同流合污、狼狈为奸、狐群狗党是近义词。如果知道了这个意思，估计大家都会避而远之，或旗帜鲜明地声明：谁和你沆瀣一气？

当然，不光是学识不足的学生会出这个洋相，就是有些学问很大的师长也不免会露怯。前几年，北京一所名校校长在欢迎来访的台湾地区代表时致辞说：“七月流火，但充满热情的岂是天气，今天我们以火一般的热情，在这里欢迎……”他这个词也明显用错了。

《诗经·邶风·七月》谓：“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意即一颗叫“大火”的星渐向西方流动、下坠，天气开始凉了起来。该领导对“七月流火”的望文生义，谬之千里。

文化博大精深，不下点功夫是很难窥堂奥的。即便是学富五车的大学问家，也难免百密一疏，出现错漏，贻笑大方。

当年，著名学者章士钊把“二桃杀三士”，说成是“两个桃子杀

了三个读书人”。鲁迅就禁不住发笑说，“三士”是三个武士，而不是读书人；继而讽刺说“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古怪；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令章士钊大窘，不过他也因此受益，会永远记住“三士”的身份。

1998年6月，国学大师季羡林在《新民晚报·夜光杯》著文曰：“生于高墙官院之内，对外边的社会和老百姓的情况，知之甚少，因此才能产生陈叔宝‘何不食肉糜’的笑话。”把司马衷当成陈叔宝，以他的学养而论，纠错的可能性更大。

如果说，连文人士学都难免会在“七月流火”这样的词汇上出现失误，其他人等犯点文史错误，也就不足为奇了。

美籍华人歌手李玟听到歌曲《满江红》的歌词是岳飞写的，就十分诚挚地“请岳飞帮我写歌”。电视剧里听到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演员，一本正经地把“一杯黄土”念成“一杯黄土”，我还是没忍住笑出声来。

学无止境，天外有天。无论是研究、传播或卖弄文化，都要认真谨慎。即便有真才实学，满腹经纶，若需出声发言时，也应做足准备，不能想当然，对自己的记性太自信。弄不懂的词，查查《辞海》；念不准的字，翻翻《字典》；把握不好的典故，翻翻常识书。再不然，就不懂不乱说话，免得张冠李戴，忙中出错。



月湖一景 (史 骅 摄)

闲谈宁波话

宁波以港市，是中外闻名的商埠。现存月湖的高丽使馆，说明宁波在唐朝时，已是与日本、朝鲜及东南亚一些国家通商的主要港口。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和清政府签署《南京条约》中的重要条款之一，是将宁波和广州、厦门、福州、上海五处辟为“通商口岸”，实行自由贸易。在宁波江北区，至今仍有英法等国所建的西式楼房和教堂。

和 风

“五口通商”后，西方文化的洋风也吹到宁波大地上，宁波人的言语谈吐中，就开始“洋话连篇”。

比如称弹簧锁为司必林(Spring，意为弹簧)，称垫圈为华司(Washer，意为垫圈)，称水泥地为水磨汀(Cement，意为水泥)。我初到宁波时，走在宁波街头，以为宁波人都学过英语。

宁波人聪明，善于借鉴。如称一些固执的老人为“阿而猫”，据说这是从英语(old man)音译过来的。阿，是粪，在宁波地方话中还有脑子不清和固执之意，“阿而猫”就形象生动地描绘出一个猫一样弓背弯腰的糊涂老头形象，而且还带贬义的调侃之意。

宁波人还常把英语、日语甚至荷兰语转化为宁波话，如称味精为“味滋素”。这三个和吃搭界而组成的名词，很耐看，让人想到有滋有味的美食。“洋话连篇”的宁波人，就有这种灵光一闪的

智慧。

宁波人还有“崇洋”不“媚外”的思想，以前总是把煤油灯盏称为“美孚灯”(Medley lamp)，就出自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这种“崇洋”还表现在多个方面，如有些中国暂时制造不出或有困难又不想制造的东西，宁波人都一律冠以一个“洋”字解决，如：洋火(火柴)、洋烟(外币)。

“宁愿与苏州人吵相骂，不愿与宁波人讲闲话。”这意思是说，虽同出吴语一系，但苏州话“糯”，即使吵架也好听；而宁波话“硬”，即使说话也像吵架，侧面反映出宁波人常从优雅的口中说出粗话。

这是因为，宁波话中至今仍保留着不少中古音。而从词义的角度来看宁波方言，会发现，它的三音节、四音节的俚语、俗语、比喻语、方言成语以及更多音节的短语和谚语，不但可以书写，而且十分精彩生动，这些正是宁波话中最有生命力的因素。

如：烂好人(老好人)、样有

份(什么事儿都沾边的人)、老油条(处事经验多而油滑的人)、黄豆汤(傲慢自大的人)、贼笨佬(愚笨的人)、万三句(好说大话的人)、书独头(书呆子)、轻骨头(指轻浮不自重的女性)、强讨饭(强行索取的人)、漆糊涂(糊里糊涂的人)、好好先生(老好人)、顺屁和尚(人云亦云的人)、死藤南瓜(没主见的人)、桥头老三(样样懂的人)、灶跟无赖(只会在家里耍赖的人)、播倒买主(自暴自弃的人)、翻白泥螺(不顾脸面的人)、小吊码子(小气鬼)、大襟布衫(只拿进不拿出的人)、铁丝搭箩(吝啬不肯花钱的人)、要钿呀郎(只想得好处的人)、脱底茶箩(吃光用光的人)、饿瘪丫么(饿鬼)等等。

宁波人对不同品性的人，赋予不同的称谓，除了戏谑诙谐的因素之外，也寓有褒贬好恶之意。

正因为宁波方言中，固执地保存着这些因素，以聪明著称的宁波人，学普通话往往非常困难。

宁波本地人学不好流利的普通话，就玩起幽默的“高级黑”，碰到外地人，先会来一句：我普通话讲得不好，是“灵桥牌”。

灵桥，横跨奉化江，是中国第一座有中国工程师参与设计的单孔钢梁环形桥，一直是宁波的标志性建筑，也是宁波人的骄傲。宁波人说普通话，要加一个属于宁波的“前缀”，自然就是“灵桥牌普通话”。但我觉得，强行对外来客人灌输“灵桥牌普通话”，多少就有点“阿缸无赖”(臭不要脸)的意思了。该做的，还是要老老实实学学普通话。

讲“灵桥牌普通话”的宁波人，闹的笑话还是不少。据说多年前宁波一位供销员，某次进京办事，用光了圆珠笔的笔芯油后，向宾馆服务女生要点圆珠笔芯，结果让京城的服务女生大跌眼镜，因为他把圆珠笔芯说成“女子背心”。

在宁波话中，“张蒋”不分、“江港”不分、“郑陈”不分。许多外地人来宁波，喊姓蒋的为jiǎng师傅，喊姓张的为zhāng师傅，结果被宁波人说成是“白字先生”，我就碰到过。

漫画角



托举

田志仁 绘



操错了心

王成喜 绘

新知

吴 晔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近日提出，“双碳”计划将会带来一次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一个重大的技术创新和投资机遇，一场配套的制度变革和创新，一次生产生活方式、发展理念和方式的系统性重大变革。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起步阶段，刘世锦从分析节能、减碳、能源安全三个指标的特点和关系出发，提出三个观点：

减碳不能单打一，而应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出发，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因为中国总体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仍然有很大区别。发达国家工业化的高峰期已经过去，进入了服务业为主的阶段，常规污染问题基本解决，生态环境总体上比较

好，经济增长速度相对缓慢，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减碳。但中国情况不一样，环境污染问题真正的拐点还没到来，生态破坏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更重要的是，我们依然有必要也有可能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更具体地讲，就是中速增长还可以保持10年左右。这几个方面都很重要、都要抓，而且都要硬，不可偏废。如此，才能形成一个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协同机制。

减碳不能是运动式的。应该明确，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是要用绿色技术替代传统技术，是要减少碳排放而不是减少生产能力，不是降低增长速度，更不是在不具备了绿色技术和供给的情况下人为打乱正常的供求秩序。所以，在这个

过程中，一定要遵循绿色转型的规律和市场规律，否则很可能适得其反。通常我们讲，“破旧立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但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应该是新的不来旧的不能去，这就是中央强调的“先立后破”。所以，着眼点还是重点放在形成新的绿色供给能力上，在确保产业供给安全、能源供给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实现绿色转型。

减碳指标不能错位。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用实物的数量指标，比如某个行业的产量、生产领域中包括能耗在内的投入品的数量，作为(或者实际上成为)宏观考核和监管的指标，很容易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我们应该少用、慎用行政性办法，多用经济性、市场性的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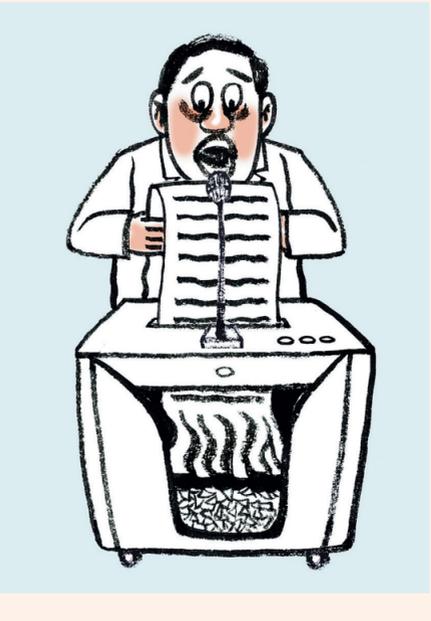
法减碳。

在实现“双碳”目标起步期，还是要做一些对绿色转型属于打基础、立长远，现在必须要做的一些事情。这里面重点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关于制度创新，刘世锦认为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就是建立碳账户，还有生态账户，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绿色责任账户。

此外，他还特别强调地方的创新，呼吁给地方更大的自主创新空间，一方面做一些“规定动作”，另一方面再做一些“自选动作”，调动各地创新的积极性，把我国“双碳”目标通过建立碳账户和积极探索，能够真正落实到地、落实到位，扎实有效推进绿色转型。

来源：浙江日报

“减碳”不是“减速”



某些「落实」

鲁楠 绘